

十大奸臣(三)

董原 主编



目 录

盛世奸相杨国忠	1
卖国求荣张邦昌	43
汉代叛王刘濞	70

盛世奸相杨国忠

一、杨贵妃专宠

杨贵妃是中国古代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。她与唐玄宗之间曲折而动人的爱情故事，既为盛唐气象增添了斑斓的光彩，又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变息息相关。

杨贵妃（719-756），小名玉环，原籍蒲州永乐（今山西省永济），出生在蜀州（今四川成都）。她出身官宦世家，杨玉环的高祖父是隋朝名臣杨注。父亲杨玄琰在开元初年曾任蜀州司户，底从七品下的刺史衙史，掌管户籍、计账、道路、逆旅、婚田等事务。杨玉环还有两个叔叔，一名杨玄珪，似在家乡；一名杨玄璈，官为河南府上曾参军事，也是七品下衙史，掌管津梁、舟车、舍宅、百工众艺等事务。杨玉环前面有三个姐姐，史称“大姨”、“三姨”、“八姨”，一个哥哥，名杨钊，另外，还有一个从兄，名杨锜，是叔父杨玄珪之子。杨玉环十岁左右，父母双亡，叔父杨玄璈把她领到河南洛阳抚养，视为掌上明珠。

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正月，唐玄宗率文武百首、宫妃、皇子、公主等巡幸东都洛阳，成为空前之盛况。次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册立杨玉环为寿王李瑁的妃子。当时杨玉环刚刚十六岁，有绝世之姿容，已成为洛阳第一美女。

李瑁是唐玄宗第十八子，为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所生，深得父亲宠爱。开元二十四年（736）各十月，唐玄宗从洛阳返回长安。杨玉环也随同寿王到了京城，度过

了四年余的王妃生活。

武惠妃过世后，唐玄宗常郁郁寡欢。一方面，他毕竟宠爱武惠妃长达二十多年，自然是对她难以忘怀；另一方面，苦于找不到中意的新人而懊恼不已。太监高力士摸准主子心态，四处选美，杨玉环最后成了合适的人选。杨玉环与寿王成亲以来，始终没有生育，无子女牵累。寿王李瑁自母亲武惠妃死后已渐渐失宠，眼看着自己的妃子被夺走，岂敢怨怒。

杨玉环天生丽质，倾国倾城，白居易的诗中称她“回眸一笑百媚生”，“六宫粉黛无颜色”。她入宫以后，唐玄宗就把后宫的三千佳丽抛到九霄云外，“专宠”她一人。他们天天厮守在一起，形影不离。杨玉环每次乘马，皆由高力士亲自为她牵马执鞭。唐玄宗每年十月幸临骊山，一定要杨玉环与他同乘辇车，以显示她特殊的地位和身份。听说杨玉环爱吃新鲜荔枝，讨她欢心，唐玄宗不惜兴师动众派人从四川涪州将荔枝用快马运往长安。后来，唐玄宗迷恋于杨玉环，连早朝都不上了。天宝四载（745）八月，二十七岁的杨玉环被正式册立为贵妃。

客观地讲，唐玄宗迷恋杨贵妃，主要还是感情上、志趣上的情投意合，而不只是对她容貌的痴迷。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情爱，本来无可厚非。但作为一国之君，唐玄宗沉润声色、荒于政事，在政治上种下了隐患。为了显示对杨贵妃的宠爱，抬高她的身价，唐玄宗对杨氏一族全都大加封赏。杨贵妃的生母被封为凉国夫人，亡父杨玄琰累赠太尉、齐国公，叔父杨玄珪升授光禄卿，见杨钊为殿中监（后授三品、上柱国），从兄杨钊为待御史。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、魏国夫人和秦国夫人。三位夫人都是才色双全，唐玄宗称她们为

“姨”；她们也得到玄宗的恩宠。可随便出入宫掖，势倾天下。每人年得脂粉钱一千贯。唐玄宗每得四方上贡的珍异之物，都要分赐给杨家姐妹兄弟，每家一份，五家都一样。唐玄宗每次到临潼温泉去度假，杨贵妃陪驾、杨氏姐妹兄弟五家也一起随行。五家每家为一队，各穿一种颜色的衣服，五家合队，色彩绚丽如百花盛开。在京师长安，杨氏姐妹兄弟五家的第宅，极其豪华，可以和皇宫相媲美。他们每造一堂一室，动辄花费千万。

在唐玄宗的宠爱迁就下，杨氏家族很快衍化出一股腐朽势力。他们仗着杨贵妃是天子的红人，滥用特权，穷奢极欲，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但杨氏家族最为得势的人物，还不是这五家，而是杨贵妃的一个远亲——杨国忠。他不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，较之前几家尤甚，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平步青云，显赫一时，成为杨氏家族政治上的代表，最终左右和影响着整个大唐帝国的命运。

二、杨国忠发迹

杨国忠，原名杨钊，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关系，亲戚关系疏远，不是直系。杨钊的祖、父辈都定居于蒲州永乐（今山西永济）。父亲杨珣，曾任宣州司主参军，家中生活穷苦。母亲张氏，是武则天宠爱的面首张易之的妹妹。杨钊从小品行不端，不学无术，行为放荡，吃喝嫖赌，为族人乡里所不齿。少年时代特有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精明机灵的特性。

三十岁时，杨钊在家乡混不下去，就发愤从军，到蜀郡当屯田兵，因成绩优异本应该提职。益州长史张宽不喜欢他的为人，就借故先打了他一顿，然后任命他当

新都尉。任期满后，杨别更加穷困，无以为生。蜀中有人叫鲜于仲通的富豪，看他相貌堂堂，言词机敏，就在经济上给予资助。这一时期杨钊和堂叔父杨玄琰家有一些小来往。杨玄琰死时，他去帮助料理丧事。不料一来二往，竟和从妹（后来的沈国夫人）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。当时杨玉环已随叔父去了河南，和这位堂兄并不相识。

后来杨钊在成都赌博，输了个精光，便逃往关中，当了几天扶风尉。因为不称心，又回到四川，依附于鲜于仲通门下。娶四川的倡伎裴柔为妻，养了几个儿子，生活贫苦，潦倒不堪。

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的消息传到四川后，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打听到杨贵妃出生于蜀，就想设法派人到长安与她家结交，以寻求政治上的靠山。鲜于仲通和章仇兼琼有很深的交情，就把杨钊推荐给他。章仇兼琼见杨钊精明机灵，能言善辩，非常高兴，委任他为“推官”。以上贡“春缣”为名，前往京城长安打点关系。

天宝四载（745）十月，杨钊抵达长安。他挨个拜访杨氏诸兄妹，分送上精美的蜀货，并说：“这是章仇公送的。”于是，得了人家好处的杨氏诸兄妹常在唐玄宗面前夸奖章仇兼琼，博得了玄宗对他的好感；并把杨钊引见给玄宗，说他精通“樗蒲”（一种赌博游戏）。唐玄宗得知杨钊是贵妃的亲属，就把他留在京师充职，允许他可随供奉官出入禁中，不久又任命他做金吾兵曹参军。这虽说是个闲职，但给杨钊日后升官发财创造了条件和机会。

在长安站稳脚根以后，杨钊利用杨氏姐妹的关系，巧为钻营。一方面，他经由虢国夫人为媒介，接近杨贵

妃，小心侍奉唐玄宗，竭力讨他欢心；另一方面，杨钊千方百计巴结权臣。有一次，杨钊参加内宜宴会，做“樗蒲”游戏时，负责计数。他记录得又详细，又精确，唐玄宗看到后戏称他是个“好度支郎”。度支郎中是户部负责统计核算财赋收支的官吏。唐玄宗这样说，无非是借此夸奖杨钊的算机精明。但杨氏姐妹抓住玄宗的那句话不放，多次提及让杨钊担任此职。唐玄宗顺水推舟，命他在御史中丞王鉷手下做判官。

天宝时期，权相李林甫陪客太子李亨，利用杨钊是皇亲国戚，得玄宗宠爱而敢在他面前进言，竭力拉拢到自己麾下。杨钊乘机投靠，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机会，因而伙同杨慎矜、吉温等人充当爪牙，积极参予迫害太子李亨势力的各种行动。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，屡兴大狱，把太子的许多党羽除去。李林甫先是提拔杨钊当监察御史，后又提拔做检校度与员外郎，兼传御史等。杨钊又善于揣摸玄宗的心思而投其所好，以聚敛有功，很快升为度支郎中。天宝七载（748）六月，又升迁为给率中，兼御史中丞，专判度支事，成为很有影响的重臣。

天宝八载（749）二月，为了显示天下殷富的景象，唐玄宗率领百官参观左藏，特赐杨利紫衣金鱼袋，以表彰他的聚敛之功。次年，杨钊兼任兵部侍郎。同年十月，唐玄宗根据标钊的请求，平反为张易之兄弟。为了表示忠心，杨钊说自己的名字带有“金”和“刀”两字，大不吉利，请唐玄宗另赐一名。唐玄宗便赐其名为“国忠”。在唐玄宗看来，杨钊是“忠”于“国”的，可以委以重任。

短短几年中，杨国忠从一个小小的判官，一跃成为仅次于宰相李林甫与御史大夫王鉷的重臣；可谓官运亨

通。诚然，杨国忠是依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步入仕途的，但究其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，还在于天宝时期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他本人善于敛财的本领。如果只靠裙带关系而没有一定的才能，以及过人的精明，他是不会爬得这么快的。

杨贵妃在杨国忠的升迁之路上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谁也不清楚。史料显示，杨贵妃本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，从不过问政事，但她客观上还是助长了杨国忠为首的腐朽官僚集团势力的兴起。为了巩固自己在内宫的专宠地位，她需要借助外戚势力的大力支持，杨国忠的发迹恰恰具备了这一条件，成为她政治上的靠山。他们是互为靠山的。杨国忠的权势越大，这种关系就越显重要。唐玄宗前半生对外戚的宠遇是很有分寸的，通常只授予闲职、散官，开元初对王皇后家属，开元中对武惠妃家属，都不委以重任。因为他深知外戚专权的危害，这股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，连君王都难以控制他们，最终祸国殃民。但对杨氏外戚一族，唐玄宗却是过于纵容，可见其晚年是何等的昏庸、糊涂。就算唐玄宗是出手牵制李林甫专权和控制朝臣的目的，也应该把握好尺度和火候。但实际上他却没有。

杨国忠能发迹，还有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，这人就是宦官高力士。他为了讨好杨贵妃，处处帮杨氏一族的忙。因为朝廷内有李林甫，外有安禄山，杨氏一门要在朝中站稳脚跟，非得有人撑起门户不可。杨钊、杨錡皆庸碌之辈，难当重任，只有杨国忠胸有成府，心狠手辣，善于玩弄权术。高力士看准这一点，就极力扶植杨国忠，使杨国忠不断得到升官掌权的机会。从开元到天宝，选择宰相一级的高官，唐玄宗大多听取高力士的意见，李

林甫、韦坚、安禄山、高仙芝等，全都得到过高力士的帮助。有了高力士的鼎力相助，杨国忠如虎添翼。

杨国忠在朝廷混到高官显位以后，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知道得更全面深入了。他发现权相李林甫有安禄山东北方镇军事力量等支持，太子李亨也有西北方镇军事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，而这两大军事集团自己根本进不去。如果没有地方方镇军事力量的支持，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、地位就有很大限制。特别是发生一些不测事件时，更是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才可能安全。因此，他急需笼络军事力量，作为政治上的后盾，而可能支持他的就是他所熟悉的剑南军镇。

当时，南诏已归附唐朝，南诏清王常带妻女来谒见汉族地方长官；路过云南时，太守张虔陀总要强留诸王的妻子，供他奸宿，并敲诈勒索。南诏王阁罗凤不肯受此屈辱，张虔阳恼羞成怒，就命人辱骂他，并向朝廷奏报反而诬陷阁罗凤并给他捏造罪名。阁罗凤被逼无奈，就发兵攻陷了云南郡，杀死张虔陀，占领夷州三十二个。唐玄宗听说阁罗凤造反不禁大惊，准备发兵攻讨。时值天宝九年（750）年末，杨国忠升为京兆尹不久，就乘机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，率兵攻打南诏。杨国忠把这当作一举两得的事情：既安插了同党，又可借此机会树立军功，以培植西南军镇势力。

不料鲜于仲通是个无能之辈，既无政治才干，又不懂军事。他率军八万，分兵两路，大军行至曲州（今四川阳通）和靖州时，南诏王阁罗凤见唐军声势浩大，惧怕抵挡不住唐军进攻，就派使者前来和谈，表示愿送还俘掠的人口和物资，修复云南郡城归唐。鲜于仲通却扣押了使者，轻率地拒绝了和谈请求，下令继续进兵。天

宝十载（751）四月，两军在西洱河交战。结果，唐军大败，六万多名士卒被杀，统帅鲜于仲通差点丢了性命，狼狈逃还。阁罗凤怕后军再次攻击，于是归顺吐着。

杨国忠对旧日恩人鲜于仲通百般包庇，极力替他隐瞒打了败仗，谎报战功，使鲜于仲通反得到奖赏。

在杨国忠的策划下，由鲜于仲通出面奏请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。玄宗听他极力强调四川地位的重要，批准了他的奏请，授杨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，充剑南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。

紧接着，杨国忠再次请求攻打南诏。唐玄宗下制，在两京（长安、洛阳）及河南、河北地招募士兵。北方兵员身强体壮，善于作战，但他们不服南方水土，害怕瘴疠之气，听说去南诏打仗，大多数人都不愿应募。杨国忠依仗权势，派御史分道督捕，强行征募，激起了关中和中原百姓的强烈不满。

杨国忠有自己的如意算盘，继续对南诏发动进攻定会有利无弊。如果这场战争能侥幸取胜，就顺理成章地树立了自己的声威，就是失败了自己也不会担心什么，因为天高皇帝远，他可以故技重演，掩败为胜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利用边镇的多事，从此控制剑南地区的军镇集团，并把它培植成仅次于东北军事集团、西北军事集团的第三大军事力量。天从人愿，不久，杨国忠又从唐玄宗那里讨得山南西道采访使的要职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。

三、取代李林甫

随着杨国忠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，他与长期操纵军国大权的宰相李林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。他们都

是腐朽贵族、官僚统治集团的代表。他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，李林甫代表旧贵族官僚的利益，杨国忠则代表新贵族的利益。一个在竭力维护既得利益，另一个则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。在玩弄权术方面，杨国忠比起李林甫，可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李林甫善于献媚取宠，妒贤嫉能，口蜜腹剑，阴险专横。他从开元二十二年（734）五月开始任宰相，前后长达十几年。面对这样一个政敌，杨国忠自有主张。他首先收买了李林甫的心腹酷吏吉温，采纳了吉温提出的剪除李林甫党羽的建议，先打击李林甫的亲信党羽。天宝八载（749），刑部尚书、京兆尹萧炅因贪赃犯罪被贬为汝阴太守。天宝九载（750），御史大夫宋浑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流放潮阳。这都是杨国忠向唐玄宗秘报并建议处治的。眼看着自己的亲信被贬被流放，李林甫对杨国忠恨得咬牙切齿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天宝十一载（752）二月，李林甫鉴于质量差劣的恶钱泛滥，奏请禁用。因为当时商业迅速发展，货币需求量大增，官铸铜钱不足以流通，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私钱。恶钱即成本较低、铸造不精的私钱。在商业繁荣的江淮地区，私钱铸造业尤为发达。贵戚官僚和巨商们为了牟取暴利，都携带着良钱到江淮地区，用一比五的兑换率换取恶钱，然后运回京城放到市场上流通，以致长安恶钱泛滥成灾。李林甫从官府拿出粟帛及库钱数十万缗，在长安东西两市回收恶钱，对有恶钱却不交出来的人依法处治。然恶钱早已流入市场，渗透较深，即刻禁止，谈何容易。奸商巨贾们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，对李林甫的举措很是不满，抵触情绪很大。杨国忠抓住这一机会，在唐玄宗面前恶意攻击李林甫。唐玄宗听信一

面之辞，在不明原委的情况下，下令废除禁令，改命为只要不是铅、锡所铸和有穿穴的旧钱，都可继续使用。这使李林甫几乎下不了台，只得仓促收场。

同年四月，杨国忠又向王鉷开刀。王鉷任户部侍郎、御史大夫、京兆尹，兼领二十余使，深受玄宗宠信。其弟王鐸（户部郎中）与邢縡勾结，阴谋叛乱。事情败露后，杨国忠控告王铁与叛乱有牵连，想借此除掉王鉷。王鉷既是杨国忠的绊脚石，又是李林甫的眼中钉，除掉王铁，本也是李林甫的心愿。但李林甫看出杨国忠别有用心，除掉王鉷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他李林甫了，如果能继续保留王鉷任职，对杨国忠是一大牵制，所以他就设法替王鉷说情。唐玄宗念王鉷久任要职，理财有“功”，疑心王鉷与叛乱无关。王鐸与王鉷是同父异母兄弟，王鐸妒忌王铁富贵，故意坑害王鉷也未可知。唐玄宗想宽恕王鐸之罪不加按问，但却要王鉷先奏请罪，然后再赦免。因此秘密下令让杨国忠将此意告知王鉷。杨国忠为除去眼中钉，故意不把玄宗的本意告诉王鉷，劝王鉷万万不可认罪，结果激怒了唐玄宗。玄宗便下令由陈希烈与杨国忠一道审理这一案件。最后，王鉷、王鐸兄弟俩皆被定为造反的罪名处死。杨国忠则捞取了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本，凡是王鉷担任的要职，全部由他兼任。从此，李林甫视杨国忠为仇敌，俩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和表面化。

王鉷事件之前，还发生了朔方节度副使、奉信王李献忠叛唐事件。李献忠原是突厥部首领，名阿布思。他率众造反，抢夺唐军府库中的财物兵器，叛归漠北，唐玄宗大为恼火。当时朔方节度使恰由李林甫兼领。发生了如此大的事件，李林甫难逃其责只好引咎辞去节度使一职，并推荐由安思顺接任。杨国忠岂肯错过这个扩大

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？他买通陈希烈和哥舒翰，共同弹劾李林甫。哥舒翰是曾为王忠嗣辩白诬陷而不怕被处死的突骑施善将，后接替王忠嗣任陇右节度使。手下拥有十几万重兵。他公开与安禄山为敌，长期与安思顺不和。而李林甫又陷害过王忠嗣，哥舒翰早就对他不满。因此，哥舒翰站在杨国忠一边。在处理这件事上，唐玄宗很冷静，他没有对李林甫指责定罪，而是采取了慎重宽大的态度，但明显开始疏远李林甫了。

天宝十一载（752）九、十月间，南诏又屡次骚扰边地，蜀人上表奏请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前往镇压，以安定川、滇局面。老奸巨猾李林甫把这看作报复杨国忠的良机，奏请唐玄宗应顺应民意，派遣杨国忠领兵攻打南诏，企图把杨国忠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。杨国忠明知是计，却又没有现由推托掉，哑巴吃黄连，有口难言。临行前，他向唐玄宗告别，哭诉李林甫在陷害自己。杨贵妃也感到这样对她和杨家都不利，就向唐玄宗求情。唐玄宗答应让杨国忠先去打仗，不久再召回朝廷担任宰相，并亲自赋诗为他送别。

各十月戊寅，唐玄宗巡幸华清宜，已重病在身的李林甫随行前往。唐玄宗知其病情日重一日，难以复原，就派使者召还杨国忠。杨国忠正在赴蜀途中，见到使者，喜出望外，马上赶回长安。

巫医给李林甫看病，说只要见皇上一面病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就在杨国忠到达华清宫的前一天，唐玄宗念及李林甫为国家效力二十多年，想满足他的要求，亲临李林甫昭应私第，可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。唐玄宗就命李林甫家人将其卧床抬到庭院，自己登上降圣阁遥望，拿着红巾向他摆动，以示慰问。李林甫不能起身跪拜，

只好让家人代为拜谢。次日，杨国忠赶到昭应私第，探视李林甫，在病榻前跪拜问侯。李林甫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，大势已去，百感交集，泪流满面地对杨国忠说：“我活不了几天了，宰相之位非你莫属，国家大事就由你去辛劳吧！”杨国忠见李林甫说穿了自己的心事，满脸是汗，谢不敢当。曾不可一世，威风八面的李林甫就这样告别了人世。

天宝十二载（753）正月，杨国忠指使人诬告李林甫生前曾与善将阿布思约以父子相称，企图谋反。唐玄宗因为李林甫已死，对此事没有细察，命令立案侦查。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害怕受牵连，就作假证说岳父确有此事。当时，李林甫的柩枢刚从临潼运回长安，还没有埋葬。唐玄宗遂于二月下诏削去李林甫宦爵，指责他外表廉慎，内怀凶险，图谋不轨，简直就是奸恶之徒。又派人打开棺材，拿走李林甫嘴里含着的宝珠，剥去身上的紫衣金鱼袋，把大棺换成小棺，按庶人礼埋葬。其子孙有做官的皆除名，流放岭南及黔中，只准许携带随身所需衣粮，其余资产全部没收。五十多名近亲和同党被株连。这样，李林甫残余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。而右相杨国忠和左相陈希烈，因追查李林甫有功，被赐爵沈国公和许国公。专极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李林甫终于被杨国忠所取代，而且死后也没落个好下场。

四、杨国忠专权

杨国忠掌权以后，所执行的政策措施和李林甫大同小异，有不少政策继续沿用下来。他更加专横、更加腐朽。自我标榜“以天下为己任”，志大才疏。在朝廷上，恃宠无所顾忌，公卿以下，他都随便指使，大臣们都很忌惮地。就连左相老臣陈希烈也畏其权宠，凡事都着杨

国忠脸色行事，不敢稍有异议。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杨国忠干脆把他排挤出相位；同时看准文部侍郎韦见亲软弱可欺，易于控制，建议唐玄宗任命韦见素为宰相。韦见素任宰相以后，基本上不敢议论朝政，只是明哲保身。这跟八年前李林甫建议任用陈希烈为宰相如出一辙。杨国忠还在地方上到处安插亲信党羽，如派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，实际行使节度使职权，以协助他管理西南各地；又任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，担任京畿、关内采访等差使，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，形成了进退可据的势力网。

按照老规矩，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，要自早期至午后六刻（约下午二时多）方能回家接待四方来客和其他人士。李林甫籍口天下太平无事不用按旧例办事，上午巳时（上午十一点）即回家。杨国忠完全继承了这一做法，甚至回去得更早。处理政务，个人说了算，对国事极端轻率。

在选拔人才方面，杨国忠任人唯亲，完全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。他提出：“文部选官时，要以资历而不是才能为标准，凡有空缺，按资历高低授官。这样做，是为了笼络人心。一批因各种原因不能晋升而久久担任原职者，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挂选上了，他们喜出望外，对杨国忠感恩在心。

依照旧例，选拔官吏由吏部侍郎以下的官员具体负责，须经“三唱三注”，才呈送门下省审核，这样从春天一直到夏天，才能完成整套程序。杨国忠担任宰相兼交部尚书以后，为显示自己办事精明利落，总是先在自己家里召集令史属交秘密圈定名单。天宝十二载（753）正月，他召集左相陈希烈及绘事中、请司长官，在尚书都

堂唱注选拔官吏，一天就结束了。杨国忠说：“左相和绘事中都在座，就算经过门下省了！”没有人敢提出异议。从此，选官大权全由杨国忠一人独揽，门下省不再审核选官，文部侍郎也只是走走形式，管试判而已。其中的谬误与弊端自不待言。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，杨国忠又在私第把待选之人都召集来，让杨氏诸姐妹垂带偷看，笑语之声，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。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倚穿着紫衣服，也被随意差道，跑前跑后，被弄得狼狈不堪。事后，杨国忠门妹妹们：“这两个紫袍‘主事’像什么人？”杨家姐妹们七嘴八舌挖苦一番，相对大笑。视国家大事如儿戏。更为荒唐可笑的是，在京兆尹鲜于仲通等授意下，入选士子们奏请直上为杨国忠在省门立碑，颂扬他选官有“功”。唐玄宗竟然答应，下制由鲜于仲通撰写颂辞。写好后，玄宗还亲自定稿，御笔改了几个字。鲜于仲通为了献媚取宠，特意将那几个字用金粉填上。

天宝十二载（753）十月，杨国忠随从唐玄宗在临潼华清宫避寒。当时他儿子杨暄正参加明经考试，结果不及格。主考官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，叫儿子昭应尉达奚抚提前告诉他。有一天，达奚抚等候杨国忠入朝上马时，赶快走过去，立在一帝。杨国忠满以为儿子必然中选无疑，面呈喜色。达奚抚小声说：“家父叫我报告相公，令郎考试不及格，但也不敢让他落榜。”杨国忠党时大怒，翻脸骂道：“我儿子还担心不能富贵？叫这班小子相卖！”打马扬长而去。达奚抚找了个没趣儿，赶忙写信报告父亲，说：“人家仗着贵势，令人恐惧，哪能再和他论是非！达奚珣无奈，只好们私舞弊，将杨暄列入上等。就是这个无能之辈杨暄，还被破格提拔，很

快擢升至产部侍郎，而曾是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交部侍郎。即使这样，杨暄还不知足，埋怨自己没有达奚珣升迁得快。

杜甫在《忆昔》一诗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时期的繁荣景象：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百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”到了天宝时期，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仍在延续，但这是以搜刮聚敛百姓财富为基础。早在李林甫专权时代，杨慎吟、王鉷和杨国忠等都以聚敛有功而受到玄宗赞赏宠信。杨国忠任宰相后，仍兼领判度支、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等财政要职，发挥自己精通“钩校”筹算的特长，增加赋税，大肆搜刮，弄得民怨沸腾。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户部奏天下郡 321，县 1538，乡 168N，户 9619154，人口 52804888，户口的众多，是前朝所不曾出现过的。

聚敛政策为盛唐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提供了基础了与保证。唐玄宗认为国家财物丰饶，故视金如土，赏赐贵妃，没有限度。杨贵妃的三个姐姐、堂兄杨及杨錡等，一个个都靠聚敛和赏赐成了暴发户，整日花大酒地，醉生梦死。而百姓们肩上的负担则一天比一天重，生计越来越难。以致于出现了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现象。

杨国忠的私生活更是纸醉金迷，腐朽堕落。初入京师时，他就常住在堂妹兼旧情人虢国夫人家里。虢国夫人是个寡妇，兄妹俩就公开在一起鬼混。后来杨国忠在长安修建了两处私宅，其中一处宣阳坊，虢国夫人的府第在宣阳坊的左边，杨国忠的府第紧挨着宣阳坊的南边。两宅相通，往来方便，从此昼会夜集，没有礼度。有时两人坐车并辔入朝，甚至还在马车上公开调情嬉闹，